

东北沦陷时期的殖民主义教育

赵家骥

东北师范大学

一九八七年七月

东北沦陷时期的殖民主义教育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五十五周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我们重新回忆一下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教育侵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是十分必要的。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宿谋已久的。早在 1927 年 6 月 17 日至 7 月 16 日，田中于东京召开了策划侵华（特别是侵略我国东北）的“东方会议”。在会议后产生的“田中奏折”中，明确地阐明了日本狂妄的侵略计划：“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之后，在日本关东军参谋石莞尔、板垣征四郎的策划下，日军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武装侵占东北的借口。当时震惊全国的“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接着在新军伐混战，东北军入关，蒋介石大举进攻红军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者便加快了侵略东北的步伐。积极策划武装侵占东北。经过多方密谋策划，制造舆论，上下勾通，调兵遣将，军事侦察等充分准备之后，终于在 1931 年 9 月 18 日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日本侵略军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沈阳、长春、吉林等城镇之后，日本关东军便迫不及待于 9 月 22 日抛出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决定扶植清朝废帝溥仪，启用汉奸，建立傀儡政权和伪国，将使日本侵略东北“以使东北与中国脱离，鼓的策划。终于在

1932 年 3 月 1 日，宣佈仿“满洲国”的成立，年号大同，首

都设在长春，改称新京。本月9日，溥仪当上了伪国“执政”。第二天，溥仪公布了关东军早已炮制好的伪政府成员名单。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同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兼驻伪满大使武藤信义与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又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该议定书承认过去日本所获得的一切权益；确认日本军长期驻扎“满洲”。因此，伪“满洲国”名为“独立国”，实质上则完全是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殖民地。此后，于1936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伪造民意，扶植溥仪称帝。又演了一幕改行帝制的丑剧，用以掩盖其赤裸裸的殖民统治。直至1945年，东北光复，日伪统治东北整整十四年。

在东北沦陷十四年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建立殖民统治秩序，实行经济掠夺、扩大侵略战争，竭力推行以奴化愚民为核心的殖民主义教育，大肆进行教育侵略，给东北青少年儿童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使东北人民的教育事业的发展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与摧残。

一、对学校教育的破坏与摧残

“九一八”事变前，虽然东北的教育比关内是落后的，但随着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同时，东北的教育事业已有一定的发展。爱国将领张学良对东北的教育建设是很重视的。曾“拨教育经费，发展各县中、小学……特别捐款扩建东北大学……”使东北大学“在建设规模上”为当时全国之冠”。他曾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以“比关内大学高一、二倍的工资，聘请名教授到校任教。张学良还捐出大批私资，建立汉卿教育基金会，资助各校经费及社会

文教育活动，资送优秀毕业生出国深造。”①等等。据统计，“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已有中、小学 1·300 余所，在校学生达 700·000 余人，教职员 24·000 余人。已有大专院校，如东北大学、冯庸大学、交通大学、奉天医学专门学校、吉林大学、吉林省医学专门学校、东北特区法政大学、东北农业专门学校、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及哈尔滨俄文专修科学校等 30 余所。其中特别是东北大学出现了一批革命青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的初期，忙于军事侵略、武装镇压，策划建立伪政权，并为了消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抗日斗争，使东北人民永远成为日本侵略者的“顺民”，供其驱使，压榨与剥削。对东北原有的学校教育进行了疯狂地破坏与摧残。曾下令：所有的学校一律停办，即关闭了各级各类的学校。同时，对广大爱国师生实行残酷地镇压和血腥地屠杀。直到 1932 年伪政权建立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狡猾地变了统治策略，想用“文治”这一手来笼络人心。于是对中、小学进行所谓的整顿、恢复和发展。同时，对高等学校亦由停办，转为恢复、创办到最后实行战时教育。但是，情况如何呢？

首先，从中、小学来看，从 1933 年初开始所谓整顿，到 1933 年 5 月前，仅恢复中、小 700 余所，尚有 500 余所未恢复。直到 1933 年末，只恢复中、小学 900 余所，学生数计 50·0·000 余人，教职员 17·000 余人。虽然到了 1942 年，初等教育有一定发展，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忙于经济掠夺，无力增设学校，只有在原有学校中增加班级，而且设

① 《辽宁省文史资料》1984 年第八期。

备异常简陋。就是日伪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初等教育……从其就学率、年龄别、学生数、教师素质、待遇、异动、学级、性别、学校数等实状或施设的内容看来，于国民的基础教育，还很令人伤心。”①实际上，东北大多数劳动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经济掠夺与剥削，已逐渐陷于奄奄待毙的状态，教育权早已被剥夺了。所以，东北儿童的就学率是很低的，失学率是惊人的。据统计，日伪统治初期，东北儿童就学率仅占23%，直到1937年，就学率仍不超过30%，失学率竟达70%以上。所以，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不得不入私塾读书。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以封建思想道德麻痹愚弄东北少年儿童，对私塾不仅不取缔，而且大力提倡。因此，私塾每年都在增加。据统计，1933年全东北有私塾832所，塾师866人，学生16·133人。到1941年，则私塾便增加到1·393所，塾师1·393人，学生38·300人，致使劳动人民的子女在私塾中接受封建迷信落后思想的灌输，使其身心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毒害与摧残。

日本侵略者借口“中学校为排日干部之养成所”，“成了排日之地方的轴心，教授训练 内容不用说，就是课外读物，第一是党义之彻底及排日思想之涵养为目的。”②从而大肆破坏中学教育。“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原有中学194所，学生38·538·575人，教职员2·464人，直到1937年，中学仅有173所，学生33·650人，教师1·676人（职员除外）。

① 《第一次满洲国文教年鉴》

② 1936年《满洲年鉴·中学校》

尤其为了降低中等教育的文化水平及培养“职工”的需要。把一些普通中学改为农、工、商、家政等科的职业学校。致于中学的就学率是很低的。例如 1942 年，入国民高等学校者计有 91·483 人，而入学者仅为 23·116 人，占 25.2%。不仅入学率低，而且退学率却是很高的。仅以 1939 年为例，入学人数为 9·067 人，而中途退学者达 483 人，竟占 50% 以上。

其次，从高等学校来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后，对东北的高等学校更是倍加破坏与摧残。日本侵略者为了阻止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和降低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在其占领初期，除了东北大学、冯庸大学、交通大学迁往关内，其余大学全部被封闭。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其对高等学校所采取的这一粗暴政策辩解说：“在民国时代，高等教育机关，奉天有东北、冯庸二大学，锦洲有交通大学，吉林有吉林大学，其他哈尔滨在苏联势力下有工业、法政二大学，然至事变勃发，各地治安紊乱，师生离散，不得已而停办。”^①又说：“至于其他各地高等教育，因规模宏大，需款浩繁，以我国目前之财力，谈何容易。”等等。意思是，当时关闭高等学校是出于“不得已”，是由于教育经费所限。实际上，军国主义分子皆川丰治却道出了天机。他在《满洲之教育》一书中说：“大学有三十多所……忘掉了学生身分，作军伐的手足而活动，狂奔排日……因此，由建国以来，国家当局，对高等教育，也特别持有慎重的态度……与建国的同时，赶快封

^① 《第二次满洲文教年鉴》

闭了旧政权时代的高等教育机关。”由此可见。当时之所以封闭东北全部的高等学校。其真实原因乃是因为爱国青年所谓“忘掉了学生身分”。“狂奔排日”。其罪恶目的是为了抵制爱国学生的抗日斗争。

到了 1933 年。随着私立学校规程的公布。始开放了两所医科大学。即奉天医学专门学校和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后来又强迫一些私立学校复校。其中有哈尔滨区立法学院。私立师范专修科。私立科诺夫高等音乐学校。私立哈尔滨东方商业学校。私立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等等。此外。先后创办了伪大同学院。建国大学。吉林高等师范学校。奉天高等农业学校等等。直到 1938 年前。东北的高等院校也不过十几所。1938 年实行所谓“新学制”之后。基于《大学令》。将奉天高等农业学校。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伪新京医学校改为大学。并将某些私立专门学校改为私立大学。如哈尔滨私立医科专门学改为哈尔滨医科大学。奉天医科专门学校改为盛京医科大学。1939 年。又将伪新京及奉天国立工矿术员养成所改为伪国立工业大学。并将奉天药剂师养成所改为类似大学的特别教育设施。此外。又设立了伪新京法政大学。1940 年。除了设立了伪新京畜产兽医大学之外。又接收了私立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学院。并改为国立大学。直到 1943 年。整个东北的大专院校也只有二十几所。设备简陋。校舍破烂不堪。

总括以上。伪统治时期。东北的高等院校比“九一八”事变以前的数量减少了。而在其仅有的二十几所大学中。有的是“事变”前已有的私立大学；有的是接收了私立大学改为伪国立大学；

有的是将原有的专科学校改为大学；只有少数几所是日伪时期创设的。而这些高等院校一般说水平是比较低的。只不过是中国高中与中等专科学校的程度，已无大学水平。即使这样的大学，仍大力限制中学毕业生进入高等学校。据日伪有关方面的统计，1943年，各大学在校生只有60000余人，教员1000余人，而其中的日本人学生与教员占50%以上。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东北学校教育的破坏与摧残还表现在对广大爱国师生的迫害。日伪政权建立后，虽然大、中、小学有所恢复和发展，但对广大爱国师生的迫害却更加野蛮与残酷。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摧残中国文化教育，推行愚民政策。对于传播文化知识，启蒙青少年民族意识的进步的教育工作者及爱国的师生，采取动辄血腥镇压的手段，企图从肉体上消灭这些民族意识和革命思想的传播者。日伪“保安局”的特务到处横行，无孔不入，侦察抗日爱国人员，密秘逮捕，囚禁或残杀。例如：1933年日伪特务机关在沈阳第一中学制造流血惨案，一次就杀害了爱国师生35人。同年5月至7月，吉林市学生因散发抗日传单和联络抗日义勇军暴动，先后被逮捕，杀害六、七十人。1934年5月，长春市二及其他学校教员，一次被日伪特务机关逮捕了9名，其中4名被杀害，其余下落不明。1935年4月，日伪反动当局在安东教育界实行的大逮捕，大屠杀更是令人发指。日伪宪警以组织“保国会”为名，将安东省教育厅和安东市、凤城、庄河、宽甸、辑安、桓仁、通化、临江、岫岩等县的教育局长、职员及所有中、小学校校长500余人一律逮捕，严刑逼供，将其中40余人刑讯致死，另有许多人下落不明。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东北教育界欠下的这笔笔血债，是罄竹难书。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我东北广大爱国中、小学教师实行大逮捕、大屠杀，1953年曾使教师人数陡然减少9.000余人。其中中学教师从1932年的3.100人，即刻降至1.300人，仅余40%。而这个数字直到1937年以后，仍无多大变化。东北人民的教育事业所遭到的这种严重的破坏与摧残，乃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殖民主义教育方针的必然结果。

二、殖民主义教育方针的制定与颁布

日伪政权建立伊始，即宣布：“进而言教育之普及则当惟礼教之是崇。实行王道主义；必使境内一切民族，熙熙皞皞，如登春台，保东亚永久之光荣……”①接着便具体规定教育方针为：“重仁义礼让，发扬王道主义。对于人民生活方面，为谋独立安全；交谊方面崇尚自重节义；而对于世界民族，以亲仁善邻共存共荣，以达于大同为宗旨。”②1937年更进一步规定教育方针是：“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之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为教育之方针。”③1940年，又再一次宣布：

① 1932年《建国宣言》

② 《第二次满洲帝国年报》

③ 1937年《学制纲要》、《学制起草上之要点》

“我国之教育本旨：奉体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彻底于诏书所示之惟神之道，涵养振作忠孝仁爱，协和奉公之精神，训育忠良之国民，更使练成之。”①等等。

这是一条典型的殖民主义教育方针。它是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法西斯统治，进行经济掠夺，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而制定的。只要剥去它粉饰性的、欺骗性的字句，其反动实质是很清楚的。它规定了殖民主义教育的方向、内容与目的，突出思想奴化教育，降低文化知识教育。其最终目的即是所谓“训育忠良之国民。”

突出思想奴化教育。在这一殖民主义教育方针中，先后提出了“惟礼教之是崇”、“发扬王道主义”、“重仁义礼让”、“崇尚自重节义”、“亲仁善邻共存共荣”、“达于大同”、“东方道德”、“忠孝之大义”、“旺盛之国民精神”及“惟神之道”等等。其中的核心内容，即是向东北青少年儿童灌输所谓“王道主义”与“惟神之道”，以养成所谓的“建国精神”。

“王道”与“神道”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吞并东北的理论基础。高唱所谓“新国家以王道为政纲，不取杂霸之术，以大同为主业，亦无种族歧视之心。”②“今立吾国，以道德仁爱为主。”

① 1944年《文教审议会答申及建议》

② 《外交部宣言》

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王道乐土，尚可见诸事实。”①等等。并在伪《国歌》中，公然提出：“神光开宇宙，表里壮皇犹，帝德之隆，……永受天祐。”还叫嚷：“惟神之道”乃“天地之公道，人伦之常经，通于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之大道，亦王道之依据，东方道德之真谛也。”等等。这就是说，伪“满洲国”是“天照大神”创造的，是藉“天照大神”的“神祐”而存在的，应该归日统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是“天经地义”的是“合理”的。而溥仪与裕仁皆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伪“满洲国”之“国民”皆是其子孙，即日本国民的一部分。因此，教育无疑应为“天照大神”“训育忠良之国民”。这就是伪殖民主义教育方针的本质。在这一殖民主义教育方针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把中国封建社会的“王道主义”与日本的“惟神之道”（皇道）结合起来，藉以向东北青少年儿童灌输服从傀儡皇帝，崇拜日本天皇的思想，以及畏天、信命、自卑的意识。宣传“皇帝尊严之不可侵犯”，要求学生必须崇拜日本天皇，服从傀儡皇帝，对日伪统治不容有任何疑心与叛乱，要集中精力效忠于他们，以巩固伪“满洲皇帝”、“日本天皇”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并宣扬封建主义的“忠孝”，迫使东北青少年儿童绝对服从，绝对牺牲，妄图把他们从思想到行动都紧紧地束缚起来，以供其任

① 《满洲国执政宣言》

意侮辱、惨害和剥削。此外，在这一殖民主义教育方针中，竭力鼓吹所谓“日满一德一心”、“日满不可分”、“民族协和”、“共存共荣”、“王道乐土”等等。所谓“日满一德一心”、“日满不可分”、“民族协和”、“实质是向东北青少年儿童灌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是“满洲国”当然的主人，居于领导地位的谬论，妄图消灭他们的国家观念及民族思想于不知不识中，使他们只知有日本大帝国，而不知有祖国。所谓“共存共荣”、“王道乐土”，更是极大的谎言和欺骗。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标榜“王道”是企图掩盖其实际所行的“霸道”。所谓的“王道乐土”乃是粉饰其进行侵略与掠夺的罪恶行径。实际上，东北的农业遭受猛烈的摧残，工商业凋蔽不堪。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被其掠夺一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行其经济掠夺计划，制定了《劳动统制法》，编制“勤劳奉公队”，抓“劳工”等等，以此来榨取劳动力。所以，当时东北人民死于挖战、筑碉堡之下者，不计其数。东北人民只有服从、牺牲、出兵役、出劳工的义务，而无自由、无生活保证，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尤其实行所谓“米谷出荷与配合”制度，疯狂地掠夺农民，农民多年耕种的良田被侵占，致使妻离子散，到处颠沛流离失所，陷于奄奄待毙的状态。对广大爱国人士

和革命师生实行残酷地镇压与血腥地屠杀。到处呈现出白色恐怖的景象。致使无数无辜惨遭杀戮者不计其数。东北青少年儿童大批失学、失业。东北人民的教育事业被严重地破坏与摧残。总之，在日伪法西斯统治下，对东北人民的侵略、压迫、剥削、烧杀、淫掠、枪毙、活埋、滚钉、灌汤、火烧、倒悬、电磨、喂狗、抽血清、投河等等，都成了“合法”的行动。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所宣扬“共存共荣”、“王道乐土”，亦即其高唱的“东方道德”。

总之，突出思想奴化教育乃是日伪殖民主义教育方针的本质特征。

降低文化知识教育。在这一殖民主义教育方针中，关于文化知识教育只有这么一句：“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与知识技能。”由此可见，其在日伪殖民主义方针中所处之地位。特别是1937年以后，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直到高等教育，除了灌输奴化思想之外，尤其强调所谓“实务教育”。在所谓《新学制大纲》中，曾明确规定：“废除注入式的观念教育及偏重知识的教育”。“以精神教育为基础，加之劳动教育…

…以造成真正能为国家宣劳之有用人才。所以无论何种学校，均为完成教育，废除以前下级学校为上级之预备阶段之旧思想。”等等。尤其特别强调要“注重劳动教育，培养爱好劳动之精神，以期不陷于偏知教育之弊。”并提出：“重视实业教育或实务教育，使初等教育与之有密切之联系，而中等及高等教育则以依此而行之为主。”这就是说，各级各类学校都要防止“陷于偏知教育之弊”，要“注重劳作教育”。其罪恶用心是为了降低中华民族的文化知识水平，使东北青少年儿童在奴化思想的毒害下，成为只具备“普通知识技能”的，供其驱使的劳动后备军。

因此，初等教育规定：“小学教育……灌输人民以国家观念；陶冶人民以高尚之品格，教授人民以应有之知识，训练人民以相当之技艺”为出发点，“以实践实用方法，养成国民必须之道德知识技能。”^①由此可见，初等教育是以培养具有奴化思想和“普通知识技能”，安于终日劳动的技工和“顺民”为目的。中等教育规定：“中学校教育，为继续小学教育之主旨，而施以较高之普通知识技能，并注重于职业的训练，道德的陶冶，以养成健全有用之国民。对女子方面，尤应特别注重家政，以便充实家庭间之生活能力。”^②并提出：“国民高等学校以涵养国民道德，修练国民精神，锻炼身体，置根基于实业教育，授与所必需之知识技能，培养劳作习惯，养成堪为国民之中坚男子为目的”；

^① 《第一次满洲国教育年鉴·初等教育》

^② 《第一次满洲国教育年鉴·中等教育》

“女子国民高等学校以涵养国民道德，特别注重妇德，修练国民精神，锻炼身体，授与女子所必需之知识技能，培养劳作习惯，养成堪为良妻贤母者为目的。”“中学以养成国家社会实际应用之人才为宗旨。”等等。这就是说，中等教育是以灌输所谓的“国民道德”、“国民精神”为主，同时授与浅近的知识技能，养成劳动习惯，成为驯服地为日伪统治服务的职业人员为目的。高等教育规定：“大学以修练巩固之国民精神，国家所必需之高等学术之理论与实际，养成国家枢要之人才为目的。”①“要使青年能真正体得建国精神，而成为无私奉公，尽忠报国的实践者，建国的先觉者，民族协和的实践者。”②这里所谓“国家所必需之高等学术之理论与实际”，乃是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经济掠夺和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而炮制的所谓“理论与实际。”这就是说，大学是以培养死心塌地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技术人才”或汉奸走狗为目的。

总括以上，突出奴化思想教育，降低文化知识教育，乃是日伪殖民主义教育方针的本质特征。其最终目的是所谓“训育忠良之国民”。所谓“训育忠良之国民”者，即是妄图腐蚀、消灭东北青少儿童的民族意识与革命思想，使之既无反抗思想，更无反抗能力，养成奴隶性格，安于被统治地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歌功颂德”，视其为“友邦”、“亲邦”，忘掉“中国”和“中华民族”。永远成为日本侵略者的“顺民”，任其驱使、压榨、剥削与宰割，俯首贴耳地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效力的亡国奴。这就是日伪殖民主义教育的实质。

① 《新学制》之《大学令》

② 《新学制三制定》

三、殖民教育的设置与实施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基于殖民主义教育方针，为了加强教育的管理与控制，最初在伪“国务院”下设的民政部有文教司，同年7月又改设文教部，后于1937年又取消文教部，改为当时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在地方最初省设教育厅，县、旗设教育局，后于1937年，省去取消教育厅，在民政厅内设教育科，亦取消各县、旗的教育局，改设教育科或在行政科内设教育股。不管名怎么改，在各教育行政机关，均设日本人次长一名，总揽全部大权，“满系官吏”乃是名符其实的傀儡。

1932年以后，随着日伪统治的加强，殖民地的学校体系便逐步建立起，来到1937年所谓“新学制”的制定与颁布已正式形成。它的特点是：

(一) 为巩固法西斯统治服务

在初等与中等教育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造成文化落后的现象，以适应其实行法西斯统治的需要，竭力实行奴化愚民教育。这首先表现在教育经营很少，缩短修业年限。日伪日期的教育经费仅占日伪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一，最多也占百分之二、三。将整个学程缩短为13年，尤其将“三三制”的中学改为修业年限四年的国民高等学校。不仅缩短年限，而且取消升学预备之性质，分为农、工、商、商船、水产等科的职业性中学。降低中等教育的文化水平。其次表现在教育内容方面，1935年以后，中、小学使用的教科书一律改为

“国定”，并指出“国定”教科书的编纂“以期彻底各种诏书及建国宣言之旨趣与明确建国精神；便深刻认识日本帝国而确实理解日满不可分之关系；以期复兴礼教，振兴东洋道德，以图科学知识进展，以谋劳作教育之振兴”为原则。①根据这一原则，凡被认为不适当的教材，一律被禁用。从而在教学内容上不断地加强反动政治思想的宣传。如在小学不断增加修身、经学的教学时数，并设有“国民科”，把日本殖民民主政治与语文混在一起，几乎占全部课时的二分之一。不仅把日伪的《宣言》、《诏书》、《敕语》等塞进教材，而且要求学生必须娴熟地背诵，一无错漏地默写全文。藉以向青少年儿童灌输崇拜日本天皇，服从傀儡皇帝的思想意识，以养成奴才观念。特别是1942年以后，不仅在小学设“建国精神”课，而且把中学“国民道德”课改为“建国精神”课，集中宣扬“惟神之道”，鼓吹“八一字”。强迫学生信仰日本迷信的“天照大神”，拥护日本发动的对外扩张的“大东亚圣战”。此外，语文课也塞满了反动的政治内容。日本历代天皇、历代将相武士、现代法西斯进行殖民侵略的军人传记，以及有关汉奸的故事，如《靖国神社》、《仁德天皇》、《佐久间大佐事略》、《曾国藩克勤小物》等等，均作为范文选入教材。并逐渐减少语文课的教学时数，从小学一年级即开始教授日语，特别是中等学校日语教学时数竟超语文课教学时数一倍以上。藉以提高做汉奸、特务、走狗所必备的日本语“能力”。因此，日语定为各级各类学校的必修课，致于文化课却逐渐减少，如物理、化学、生物合在一起成为2—4学时的“理科”，代数、几何。

①1937年《满洲国势》